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安置策略研究

阮清华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党和政府开始将大城市“非生产性”人口分成不同类别,以各种名义加以疏散。20 世纪 50 年代初,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计划疏散近 200 万人口离开上海。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仍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安置疏散人口的途径有限。由于大部分需要被疏散的人口来自农村,在城市面临困难的时候,只能把他们疏散回乡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安置策略将城乡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农村内部的矛盾,最终通过农业合作化等政治运动,将城市疏散人口在农村安置下来,从而实现减少城市人口、清理城市基层社会的目标,并为把城市建设成工业“生产基地”创造条件。

【关键词】城市人口;人口安置;社会改造;回乡生产

【中图分类号】K295.1; 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9)06—0024—11

【作者简介】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0241

在中国的前近代时期,虽然城市与农村的分隔已经形成,但大多数人的身份、职业、生活水平与其居住于城市或乡村并无太大关系。有学者认为,直到 19 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①西方学者经常以“城乡连续统一体”来称呼这种状态,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相对平等、相当和谐。^②虽然此处的“城”可能更多指向的是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但因为此时期中国大城市极少,整体上看城乡差距并不大。19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现代化工商企业在城市中兴起,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开埠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各方面的差别逐渐拉大,并且越到后来越为明显。民国时期,到城市去,尤其是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去,成为农村人的人生理想与目标。民国《川沙县志》记载“人口有余,则移之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③上海成为周边江浙皖乃至全国各地农民实现“发财梦”或至少是改善生活的第一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对比已经存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城市治理总方针指导下,新政府开始在上海等大、中城市大规模动员城市人口还乡,或者是动员到外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其难度可想而知。本文通过详细梳理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几次人口疏散的过程,想要探究的是:既然城乡差别早已形成并日渐扩大,新政权建立以后,如何有效动员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口重回农村?人民政府如何重建这些从城市中疏散的人口的农民身份?这一人口疏散和身份重建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理念?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人口身份的重构实际上包含多个方面:一是将“市民”变为“农民”,即将上海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进行安置;二是将“上海市民”变为“外地市民”或“工人”,即从上海迁往内地其他城市或工矿区;三是将农民或外地市民变为“上海人”,即外地人口迁入上海并取得上海户籍和工作。本文暂不讨论后两者。

① 卢汉超《霓虹灯外——20 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二编“导论”,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卢汉超《略论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

③ 方鸿铠、黄炎培《川沙县志》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 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第 35 页。

一 上海的“农民”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党的“中心任务”。“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②从此,“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基本政策,^③并成为共产党对城市进行管理和改造的基本指导思想,成为“人民城市工作的总方针”。^④

1949 年 5 月 27 日,解放军进驻上海,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接收和管理上海。上海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眼中最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1949 年 5 月前后,上海总人口在 540 万左右,^⑤其中一半以上被认定为“消费性人口”。所谓消费性人口当时主要指军管会接收的各类“旧人员”(即国民党政权雇员或与之关系非常密切之人员)25 万余人;^⑥各类学生将近 20 万人;^⑦“失业工人 25 万人,连同店员约 100 万人,贫民 65 万,游民 17 万,逃亡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属 10 万人”。^⑧这些被认为是“消费性人口”的群体超过 237 万人。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生产性人口”的家属们也属于“消费性人口”。

到 1955 年 4 月,上海市总人口增加到 699 万人,其中基本人口,即“在工业、建筑业和有全国意义的高等学校、铁路、海运、空运、港口等工作的人员”,共 118 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 17%;服务人口,即“在商业、市政企业、文教卫生部门等工作的人员”,约 119 万余人,也只略多于总人口的 17%;农业生产人口 20 余万人,不到总人口的 3%;其他“非在业人员”如儿童、学生、老人、一般无劳动力的人口和失业人口、临时人口约为 440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63%。^⑨所谓“非在业人员”基本上就是指“消费性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市总人口的六成多。

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理念中,“变消费的上海为生产的上海”,最重要的就是大力减少上海的“消费性人口”,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大量疏散上海现有人口。事实上,疏散城市人口,控制人口总量,始终是 1949 年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基本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城市人口疏散,尤其是从相对现代的上海疏散到相对闭塞的内地,从“先进”的大城市疏散到“落后”的农村地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在陈云的号召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成为中共治理下的上海处理与全国其他地方关系的基本政策,^⑩上海市人民政府在疏散城市人口的时候不能以邻为壑,必须在疏散的同时认真考虑疏散策略和安置问题。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来说,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上捉襟见肘,一时无法安置数量众多的待疏散人员。因此,上海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机会,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对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疏散。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即是强调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5 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1366 页。

③ 《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 年 3 月 17 日,第 1 版。

④ 《济市工商业界座谈会讨论怎样建设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⑤ 《上海概况》记载 1948 年 11 月上海人口为 545 万(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另一说 1949 年 3 月上海总人口约为 540 万(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1 页)。

⑥ 郝先中《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后上海对旧人员的接收与安置》,《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⑦ 陈毅《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49 年 8 月 13 日,第 1 版。

⑧ 《上海有多少穷人?》,《文汇报》1949 年 8 月 8 日,第 3 版。

⑨ 《市委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草稿)》(1955 年 7 月 1 日)档案号: B2—2—1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⑩ 谢忠强《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 2014 年,第 2 页。

待疏散人口最初的“农民”身份:不管是入城三五载,还是离乡数十年,只要是他们或者他们的父祖辈曾经来自农村,他们就可以被认定为“农民”。贴上“农民”的标签后,相关部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疏散、遣送,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疏散的动员效率,增加人口疏散的合法性;将其认定为“农民”,更可以相对轻松地安排他们的去向:回到农村去。

理论上来说,1949年时上海500多万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或者至少其父辈、祖父辈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而近代以来虽然城乡差别已经形成,且差距日渐扩大,但是初到城市的农民,大多数还都与故乡农村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甚至有些进城后已经小有成就的人,也会主动与乡村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随时准备回归乡村,是谓“入城又回乡”。^①或如学者所言“在大城市中,只有真正有大势力者,如上层官僚;或敢于无法无天者,如帮会头子,才能出人头地、称王称霸,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绅富商,往往与大城市格格不入,或觉得自己在城里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回到老家,则顿然如鱼得水,觉得找到了归宿。”^②总之,农村,是大多数城市人口的来源地,也是城市人口疏散的首选之地。将这些原本来自农村或其父祖辈来自农村的人口,重新认定为农民,是城市疏散人口的最重要手段。

二 遣送“灾难民”回籍与城市人口疏散的起步

解放军进驻上海后,上海市军管会一边接管上海,一边着手疏散、遣送难民。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随即在难民比较集中的沪西地区进行难民救济和疏散,到6月8日,仅仅10天内就有20万人被疏散回乡。^③但市军管会和市政府认为当时上海难民至少有180万之众,必须继续加大疏散力度。^④

6月23日,市军管会“号召福利慈善公益团体在本身条件允许下协助政府遣送无力回乡难民”。^⑤25日,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召开各区代表联席会议,并邀请文化接管委员会、铁路局、上海市联合救济委员会等单位派代表列席会议,“共同商讨动员难民回乡生产的具体执行办法”。^⑥同时,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军管会等进一步拟定了难民疏散方案,要求从6月底开始到7月,以动员难民还乡为中心,到7月底基本完成疏散上海难民100万人的任务。由于上海难民主要来自周边省份,因此方案要求华东各地派代表到上海来协助疏散工作,尤其是要求山东省府、苏北行署、皖北行署等地成立专门机构统一办理,以便实现与上海的疏散对接。^⑦7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发布指示,要求“疏散上海难民回乡生产”。^⑧从5月底到8月初,上海共计遣送离沪难民30万人。^⑨

虽然短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军管会两个月疏散100万难民离沪的目标仍然相距甚远。而且军管会还接着制定了在1949年冬天和1950年春天疏散200万人的更为宏大的计划。^⑩为此,上海市政府于1949年8月27日专门成立了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简称疏委

① 瞿骏《入城又回乡——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 卢汉超《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及其现代意义》,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7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③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④ 《动员难民还乡生产工作计划草案》(1949年),档案号: B168—1—68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军管会为减轻人民负担,遣送难民回乡生产》,《解放日报》1949年6月24日,第1版。

⑥ 《市郊区代表昨开联席会议讨论难民回乡办法》,《解放日报》1949年6月26日,第1版。

⑦ 《动员难民还乡生产工作计划草案》(1949年),档案号: B168—1—68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⑧ 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解放日报》1949年8月5日,第1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具体办法疏散上海难民回乡生产》,《人民日报》1949年8月8日,第1版。

⑨ 陈毅《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个月的工作汇报》,《解放日报》1949年8月7日,第1版。

⑩ 《上海市军管会制定方案疏散二百万人回乡生产》,《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第2版。

会) ,并在各区接管委员会下建立区疏委会 ,同时建立各区疏散工作站。^① 在此之前 ,在各区接管委员会领导下 ,很多难民重点区的基层单位都建立起保一级的难民还乡动员委员会 ,领导本保的动员工作。^② 同时 ,疏委会还与由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组织的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临救会)展开合作 ,利用临救会此前建立起来的 6 个中心工作站 ,另外抽调部分干部组成 3 个工作队下到徐汇、杨树浦和闸北 3 个区进行重点调查。各区疏散工作站 ,由各区接管专员任站长 ,原临救会中心工作站站长任副站长。^③ 至此 ,从基层的保到区和市一级 ,都建立起难民疏散的领导机关 ,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市的难民疏散网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动员工作 ,到 8 月底 ,上海市又疏散约 10 万难民回乡。越来越严密的疏散组织的建立 ,也意味着动员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实际上愿意回乡的难民越来越少 ,与政府期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政府不得不加大动员力度。但效果依然并不显著 ,从 1949 年 9 月到 12 月底 ,上海共计疏散人口 3 万余人 ,远远不能完成疏散 100 万 ,更不用说 200 万难民的计划。^④

从历史来看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基本上都是战争难民激增的时期;^⑤ 战争结束后 ,大部分难民会主动选择离开上海 ,但也有部分难民就此长居于沪。对于市政当局来说 ,大量难民在短时期内涌入上海 ,会给上海带来各方面的压力 ,因此疏散难民也是历届上海市政当局常用的手段。1942 年初日本侵占租界后 ,日伪上海市政府就在短时间内疏散 60 万难民回乡;^⑥ 1946 年国民党政权重回上海后 ,亦曾资助难民回乡 ,甚至一度计划将难民移送江西垦荒。^⑦ 疏散和遣送工作常需采用强制手段 ,1949 年 4 月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命令疏散难民时 ,甚至动用军队、军法威胁“凡无身份证及无公职证件者限即日自动出境 ,否则即派兵押解出境” ,“拒不接受押送出境者当场以军法从事”。^⑧ 可见动员难民离沪并非易事。

人民政府成立以后 ,上海继续疏散的难民 ,其实很多并非是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而迫切需要回家的战争难民或逃荒的灾民。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中说得很明白“为了克服……困难起见 ,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方法 ,疏散大批失业及无业的市民回乡生产 ,以减轻城市的负担 ,以增加农村的生产。对一些失业及无业的市民应采取回乡生产的积极方针。”^⑨ 华东局很清楚 ,需要从东南沿海大城市疏散的人口不仅仅是外地来的灾难民 ,还包括很多本地市民;而疏散的目的是为“减少城市负担”。军管会制定的 200 万人疏散方案标明了具体疏散的人员类别“失业工人、失业店员及其家属共 100 万人 ,贫民 65 万人 ,无业游民 17 万人 ,逃亡地主 10 万人。”^⑩ 对于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来说 ,要为全部人安排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人的疏散地大多数都只能是农村 ,他们只能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此后的各种宣传动员中 ,临救会和疏委会以及民政局工作人员都再三强调 ,要打消难民的各种顾虑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向难民说明 ,他们原本就是农民 ,现在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 ,即使离家多年 ,回去以后政府将分给土地、房屋;即使从来不会或者早已不会农业生产 ,政府也将分配工作或介绍其他职业。

1949 年 7、8 月以后 ,真正急于回乡的难民并不多 ,而上海此时要疏散的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失

① 《市政府关于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材料》(1949 年 9 月) 档案号: B1—2—281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静安寺首批难民免票还乡》,《解放日报》1949 年 7 月 28 日 ,第 1 版。

③ 上海市疏委会《九、十两个月综合报告》(1949 年 11 月 17 日) 档案号: B1—2—3565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工作总结》(1949 年 12 月) 档案号: B168—1—683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 3—5 页。

⑥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19 页。

⑦ 邱国盛《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演进(1840—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88—89 页;阮清华《“保产”还是“安民”——从“寄枢所风波”看内战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两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⑧ 《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联合布告》(1949 年 4 月 27 日) 档案号: Q1—10—335 ,上海市档案馆藏 ,转引自邱国盛:《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演进(1840—2000)》,第 89 页。

⑨ 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1949 年 8 月 5 日) 档案号: B168—1—680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⑩ 《上海市军管会制定方案疏散二百万人回乡生产》,《人民日报》1949 年 8 月 13 日 ,第 2 版。

业、无业人员、无业游民等,但为了使疏散能够变成一场“群众运动”,^①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必须借助疏散难民的名义来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在战争结束后,战胜者协助难民还乡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既是清理占领区的必要工作,也能赢得真难民感激之心。同时也只有用疏散难民的名义,才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各种民间组织和力量来协助政府工作。再者,既然是逃难之民,当然就意味着不是本地居民,在本地自身困难的形势下,疏散难民也是天经地义之事,还能获得被认定为本地市民者的支持和协助。因此,逃难来沪、流浪街头者是难民;失业工人经总工会动员回乡者也是难民;在街头游荡、经过教育愿意回乡者是难民;法院、公安机关“判处回乡或到农村参加生产改造之无业者”,只要愿意回乡,亦可算难民;甚至被各机关遣送回乡之旧职员、工友,仍可算在回乡难民之中。^②也就是说,只要愿意离开上海,都可以在疏散难民的运动中加以处理,即使是无业游民也可以不要经过收容改造这一程序而直接回乡,但如不回乡则可能动用法院、公安机关来处置,最终仍然必须离开上海。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即决定要大规模疏散上海人口,因此早在1949年6月,市政府就认为上海难民人数高达180万人,当年需要疏散100万之多。^③1949年3月,上海总人口是545万人,^④这相当于将上海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认定为难民,而当年需要被疏散的人口亦高达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军管会后来制定的方案计划疏散200万人,更是占到当时全市总人口的四成左右。^⑤上海火车站所在的北站区,被认为是上海难民重点区,其中第四办事处管辖区域又是北站区的难民重点区,其铁路以北的十个保有居民10万人,其中被认为是难民者近3万,这十个保中的五个保有人口约8000人,分别有5000多人被认定为难民,超过总数的60%。^⑥有些人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或者好几十年了,也被作为难民动员回乡。^⑦

1949年下半年,华东、华北、中南地区普降大雨,上海人口疏散的主要目的地苏北、皖北和山东等地受灾严重,灾民数以千万计,大量难民从上海遣送回家后又成为灾民倒流回沪,同时更多的灾民逃荒到上海。随后中央内务部明确要求各地暂停人口疏散工作,对“已逃至各地之灾民,不得强制遣送回籍,应即发动当地群众,在自愿原则下互助互济”。^⑧上海不得不暂停难民疏散,转而设立庇寒所收容流落街头的灾民。1950年2月上海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重新开始疏散灾难民政策。此后该项工作在上海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尽管华东军政委员会要求对“各地灾民来沪已有一定谋生条件或者已参加生产,不依赖当地政府救济者”不得遣送回乡,上海市虽也强调其遣送回乡的都是“真正的灾民”,^⑨但实际上还是有许多已经在上海生活多年,甚至已经找到工作,并且有了自己住所的人被当作“灾难民”遣送回乡。

三 动员“农民”回乡生产

1955年4月上海市开始动员季节性外来船民回乡生产,到7月1日上海市委正式发布“紧缩上海”的指示,要求采取“严格限制迁入、积极鼓励迁出”的方针,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疏

① 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1949年8月5日),档案号: B168—1—68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关于疏散遣送时发给路粮车船票之标准决定》(1949年),档案号: B1—2—3565,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 《动员难民还乡生产工作计划草案》(1949年),档案号: B168—1—68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91页。

⑤ 军管会方案是在华东局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指示发布以后提出,当时上海已经疏散30多万人,因此其时上海总人口约为500多万人。

⑥ 《北站区用活的事例作解释 四千难民先后回乡》,《解放日报》1949年8月15日,第1版。

⑦ 《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秘书处通报》(1949年9月30日),档案号: B1—2—28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⑧ 《上海市人民政府训令》(1949年12月),档案号: B169—1—68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 上海市救济分会《呈报有关灾民收容遣送工作问题》(1951年4月2日),档案号: B1—2—492,上海市档案馆藏。

散全市人口 50 万—100 万人,其中动员、遣送外来居民 40 万—60 万人回籍生产。^① 7 月 2 日,市委办公厅即针对性地提出了《动员外来城乡居民回籍生产方案》,规定“凡在本市无正当固定职业而原籍又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外来城乡居民均应大力分批动员回籍,其主要对象是:(1) 无业、失业或没有正当固定职业的市民,在原籍有生产或生活条件者。(2) 对临时户口和漏户、漏口,除按照户口管理的规定,可留住本市者外,一律动员。(3) 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学校的员工家属,原在农村或其他城镇从事生产,回籍后仍有生产条件者,或具有劳动力,可以回籍生产者,或虽不能从事生产,但可以回籍生活者。(4) 由外地吸收来沪的佣工、保姆、临时工原籍有生产、生活条件者。(5) 解放后从农民转为工商企业之职工、店员,虽系在职在业,目前由于企业生产陷于极大困难,一时不能解决,而本人原籍又有生产条件者(但应防止资本家乘机钻空子)。”此外,在动员影响下,如有在职员工自愿回籍者,也可协助其回籍。^② 动员的主要对象为在上海“无固定正当职业”和“原籍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外来城乡居民。

7 月 15 日,负责人口疏散工作的民政局出台动员方案——《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方案》,规定“凡原籍有生产条件(即有土地、有劳动力)或生活条件(即在原籍有依靠或有亲属汇款供养)、必须和可能动员回去的农民,都应该大力动员回乡生产”。^③ 其具体类别包括以下几类:(1) 在本市等待就业和无正当职业或固定职业的;(2) 机关、部队、企业、学校员工和居民的家属、保姆、佣工等;(3) 工厂企业的临时工;(4) 在现有困难行业应行解雇的职工中,原是来自农村的农民。

疏散“农民”回乡生产工作自 1955 年 4 月开始,7、8 月间形成第一个高潮,到 8 月底疏散 30 余万人。9 月稍事休整后,从 10 月开始继续疏散,到 1956 年 3、4 月间又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从 1955 年 4 月到 1956 年 6 月,上海市通过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方式,共计疏散人口 637 255 人。^④ 被疏散回乡的人口中 1945 年前来沪者占 15.6%,1949 年前来沪者更是占到 30% 多。^⑤ 甚至有部分被疏散回乡的人已经在上海生活了数十年,依然被作为农民疏散回乡。^⑥ 被疏散回乡的 637 255 人中,拥有上海市常住户口者 450 613 名,占总数的 70.7%;临时户口 34 646 人,占总数的 5.4%;明确无户口的只有 10 740 人,占总数的 1.7%;另外 141 256 人户口情况不详。^⑦

“动员农民回乡生产”作为疏散城市人口、减少城市压力的重要手段,此后在上海被多次运用。1957 年 3 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要求“开展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计划将“各地盲目流入本市的灾民和其他城乡人口”、干部职工军警居民的家属、私自跑回本市待机就业的垦荒群众和外调职工动员回籍,参加农业生产。^⑧ 1959 年上海再次发动“动员农村劳动力回乡生产”,从 3 月 19 日到 6 月 10 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动员和遣送了 25.3 万人回乡生产。报告中特别说明,“这些人员中属于盲目流入本市的外来人口约 6.2 万人”,也就是说其他的 19 万余人是早就生活在上海的人口,他们也被动员离沪回乡,重新投入农业生产。^⑨ 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都在持续不断地动员农民回乡生产,或者外迁早已在沪的部分人口返乡务农,重新从事农业生产。

① 《市委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草稿)》(1955 年 7 月 1 日) 档案号: B2—2—1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上海市委办公厅《关于动员外来城乡居民回籍生产工作的初步方案(草案)》(1955 年 7 月 2 日) 档案号: B2—2—1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 《中共上海市委批发上海市民政局党组〈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方案〉》(1955 年 7 月 21 日) 档案号: A 45—1—1—105,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以上数据来自不同日期的《上海市回乡生产人数统计表》档案号: B25—1—15、B168—1—866—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上海市回乡生产人数统计表(1955 年 4 月—1956 年 6 月)》档案号: B168—1—866—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⑥ 《张志强给民政厅党组并报省委、政法党组的报告》(1955 年 9 月),《江苏省民政厅小组给政法党组及省委的报告》(1955 年 9 月 10 日) 档案号: 苏 3085—长期—115,江苏省档案馆藏。

⑦ 《上海市回乡生产人数统计表(1955 年 4 月—1956 年 6 月)》档案号: B168—1—866—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⑧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计划》(1957 年 3 月 10 日) 档案号: B127—1—8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 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本市检查小组《关于动员农村劳动力回乡生产的工作总结报告》(1959 年 6 月 27 日) 档案号: A11—1—34—32,上海市档案馆藏。

作为回乡生产的农民,他们回乡以后如何顺利投入生产工作?据江苏省的调查,1955—1956年上海动员回乡的人员中,至少有10%—15%的人“无家可归”,“他们家中既无土地又无房屋”;回乡农民的土地“有半数低于当地群众的平均田亩数”,其中“不够维持生活”的很多。如江都县三墩乡回乡38户50人,其中50%的人拥有土地低于当地人均水平(1.27亩),他们平均只有0.8亩左右的土地,最少的人只有0.29亩。樊南乡回乡人员土地拥有量占当地平均数70%以下的有37户161人,占回乡人口的48.4%。^①回到小镇的人员土地更加缺乏,超过56%的人没有任何土地,小镇也无法提供其他工作安排。这种情况对于江苏省的安置工作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江都县樊南乡被动员回去的76户、157人中有44.5%需要临时或长期救济。^②

1955年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自7月市委发布指示开始,其动员对象有一个逐渐具体化的过程,市委提出动员“外来居民”回籍生产,市委办公厅提出动员“外来城乡居民”,而民政局进一步限定为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外来城乡居民”包括外地城镇居民和农民,“回籍生产”也意味着可以回农村或者是外地城镇参加劳动;但是民政局将对象限定为“农民”后,自然只能回乡生产。此后上海在动员“盲目流入本市的农村劳动力”回乡生产时,依然强调将动员对象定义为“农民”。作为直接负责人口疏散工作的民政局明白,将需要疏散的对象尽可能严格限定在“农民”身上,在动员的时候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土改以后,从整体上说所有的农民都已经分得了一份土地,在城市面临困难的时候,动员有土地的农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同时,由于其时其他城市也在疏散人口,如果将外地城镇来上海的人口也疏散回原城镇,势必引起城市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周边地区对疏散人口的接收和安置。实际上,上海人口疏散的主要目的地江苏省、安徽省和浙江省派代表与上海市政府就人口疏散和遣送的对象、规模以及进度安排等进行协商时,三省代表都要求对疏散对象进行严格限定,但上海明确告知代表们回乡对象“不一定限在农民成分”,即上海要动员回乡的并非仅仅是农民;而当浙江代表提议干脆将动员范围改为“农民和其他必须和可能回乡的人口”时,上海却又不肯采纳这个建议。^③就是因为既要在宣传上严格限定动员回乡者是农民,又要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动员各种人口离沪,正如市委副书记陈丕显所言,“不如此,疏散人口的出路就很窄”。^④

因此,1955年及以后历年上海“动员农民回乡生产”运动中,虽然将许多已经在上海生活很长时间的人口疏散出去,但其身份却始终被定义为农民。即使这些人长期生活于上海,并且大多数也都取得了上海户籍,在乡下已没有房屋和土地,但是他们依然被认定为农民而疏散回乡。1955年,天津市也曾大规模动员“农村人口还乡”,当年该市外迁15万多人回乡,实际操作中也将许多早就在天津生活、工作的人口疏散回乡,重新转化为农民。^⑤将城市中各类“剩余人口”疏散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将其重新转化为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大城市都曾采取过的措施。

四 移民垦荒

1955年7月初上海市委关于“紧缩上海”的指示中还提出“根据可能的条件,有计划地移送本市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或可能转业的劳动力至外省进行垦荒”,并指示相关部门派专人到江西、安

① 《中共江苏省民政厅党组给政法党组和省委的报告》(1955年9月10日) 档案号:苏3085—长期—115 江苏省档案馆藏。

② 《江苏省扬州、盐城、苏州、镇江四个专区八个县十九个乡、六个镇1955年七八月从上海回乡农民的主要情况综合统计表》档案号:苏3085—长期—115 江苏省档案馆藏。

③ 《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范围(草稿)》(1955年8月) 档案号:B25—1—1—44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张志强给民政厅党组的报告》(1955年8月27日) 档案号:苏3085—长期—115 江苏省档案馆藏。

⑤ 来新夏主编,陈卫民编著《天津的人口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徽、江苏、浙江等地区调查了解荒地及移民的可能性和条件。^① 最终“地多人少”^②的江西成为上海大规模移民垦荒的首选之地。经过上海市委与江西省委协商,选定江西九江、吉安、上饶、南昌和抚州 5 个专区作为接收上海移民的地区。8 月底上海市委决定向 5 个专区移民 9 万户、约 30 万人开荒生产。^③

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口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上海方面采取“条块结合”和“包干分工”的方法动员各类人员前往江西垦荒。最初确定的动员对象包括社会青年、未登记的失业工人、失业学生(高小、初中毕业生)、流动摊贩、过剩三轮车工人、已登记的失业人员、码头编余工人、固定摊贩及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过剩船民等九大类,即未能升学和就业的青年、失业工人和需裁撤的部分行业从业人员三大类。市委反复强调动员要贯彻自愿原则,并且提出动员对象需满足 6 个条件:即有劳动力;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或其子弟;历史清楚,不是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身体健康;完全自愿,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属通、亲邻通);要有决心不做逃兵。在动员分工方面,青年团市委和各区负责社会青年等前四类人员;交通局包干剩余三轮车工人;劳动局动员已登记失业工人;港务局负责码头编余工人;水上区包干剩余船民;商业二局负责服务性行业人员和固定摊贩的动员。^④

从 1955 年 10 月上海开始进行移民垦荒试点,到 1956 年 1 月共计迁送 4 712 户、7 498 个上海劳动力到江西,连同家属共计 12 961 人。^⑤ 1956 年初市委确定全年组织无业、失业人员 61 000 户、231 500 人到江西垦荒。^⑥ 3 月,该数字扩大到 8 万多户约 30 万人。^⑦ 从 1956 年 2 月起上海开始大规模迁送垦荒群众到江西,到 4 月底共计迁送 4 332 户,连同家属共计 20 162 人。^⑧ 但该运动到此结束,加上试点时期的移民,上海共计迁送 33 123 人,只完成了原定计划的十分之一。其中人力车、三轮车工人 9 129 人,^⑨水上船工 3 862 人,^⑩上海市运输公司工人 279 户 800 多人。^⑪ 其他大多是失业工人和其他“被淘汰行业”工人以及部分未就业的社会青年等。这些人原本大多是有各种职业的“工人阶级”,但是在 1955 年的“紧缩上海”中,“有田回乡,无田开荒”,反正是“无职业的一律回乡”;^⑫而且工作人员还警告他们“迟走不如早去,早去不如就走,越快越好”。^⑬ 在此背景下,这些父辈或自身久已离开农村的农民们被迁送到江西农村开荒种地,再次成为农民。

市委确定的移民江西垦荒的动员对象原本包括三大类九个方面的人员,但是在实际动员过程

① 《市委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草稿)》(1955 年 7 月 1 日) 档案号: B2—2—1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江西人口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 2 600 万,到 1955 年时只有 1 720 万;而江西有宜垦荒地 200 万亩,加上红壤则更是高达 1 700 万亩,理论上可以接收大批垦荒移民。参见上海市人委人口办公室《关于 1955 年江西安置上海志愿垦荒群众和 1956 年江西拟安置上海志愿垦荒群众的情况报告》(1956 年 2 月) 档案号: B127—1—1429—89,上海市档案馆藏;江西省委、省人委《关于安置上海市来我省垦荒群众的联合指示》(1955 年 10 月 20 日) 档案号: X 035—4—349,江西省档案馆藏。

③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组织失业人员赴外地垦荒进行摸底工作的通知》(1955 年 8 月 29 日) 档案号: B127—1—1429,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委认为江西地多人少,全省有宜垦地达 200 万亩;另外江西劳动力分布不均衡,许多地方劳动力负担土地面积过大,广种薄收,效益不好,农民可以让出部分熟田。参见《从江西的情况来看本市组织劳动力到江西去垦荒是否有条件的问题》(1955 年) 档案号: B168—1—86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对动员自愿垦荒工作的初步意见》(1955 年 11 月 7 日) 档案号: B 168—1—86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市委原定作为试点的垦荒人数是劳动力 6 000 人,连同家属共计 1 万人。参见《关于本市群众到江西垦荒试点工作的初步总结(草稿)》(1956 年 2 月) 档案号: B168—1—86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⑥ 《本市 1956 年紧缩人口计划(草案)》(1956 年) 档案号: B25—1—2,上海市档案馆藏。

⑦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本市 1956 年度移民江西垦荒经费预算报告》(1956 年 3 月) 档案号: B25—2—17—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⑧ 《移民垦荒工作总结(草稿)》(1957 年 1 月) 档案号: B168—1—872—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 上海市交通局人力车三轮车管理所《1956 年 3、4 月份动员三轮车车工去江西参加垦荒小结》(1956 年 4 月) 档案号: B25—2—9—7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⑩ 《水上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工作简报》(1956 年 6 月 4 日) 档案号: B59—2—78—168,上海市档案馆藏,转引自田蕊《权力、社会与地方利益博弈——以 1950 年代上海水上区居民的迁移与安置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 年,第 39 页。

⑪ 《上海市运输公司动员组织输送垦荒群众小结》(1956 年 4 月) 档案号: B152—2—92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⑫ 《本市动员农民回乡工作概况》(1955 年 8 月) 档案号: B2—2—1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⑬ 《移民垦荒工作总结(草稿)》(1957 年 1 月) 档案号: B168—1—872—1,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虽然也有部分失学和未就业的青年被动员到江西垦荒,但他们所占比例极小;^①最终上海移民江西垦荒的对象主要是各类人力车、三轮车工人、水上船工和其他运输工人,以及大量失业工人,他们大多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甚至长达几十年之久,并且大多数人的身份已经是工人或者至少以前是工人,只是目前失业,成为了失业工人。这些人在城市人口疏散中被迁移到江西农村,重新成为了农民。

大城市移民垦荒并非上海首创,1950年北京市和天津市就移民2万余人到绥远和察哈尔两省从事农业生产;1955年4月到6月,北京市移民3000余人到甘肃垦荒。同年8月,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移民黑龙江萝北县,随后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也开赴北大荒,从而拉开1955年全国垦荒大幕。上海移民江西垦荒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动的,但最终上海迁移3万余人到江西垦荒,其中垦荒青年只有1700余人,其他均是各类工人和失业工人。^②

事实上,这些在沪多年的农民已经很难从事农业生产,难以适应农村生活,他们到江西后,很快就开始“倒流”回沪。从1955年垦荒试点阶段开始即有人从江西跑回上海,1956年以后跑回上海者更多,到1959年移民江西垦荒的3万多上海人,先后有2万多人“倒流”回沪。但是这些“倒流”人员大多数又被第二次、第三次动员回江西参加垦荒,或者是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少部分去了甘肃和安徽等地;其他实在不愿意回江西垦荒的,也尽量安置到上海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只有极少部分始终不肯离开上海,才勉强解决户籍问题。^③此后疏散到其他地区从事农业生产而倒流回沪者,也大多安置到郊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④

结 语

将人口疏散到农村,使之重新成为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城市人口疏散的最重要方式,也在许多大城市中得到了有力运用。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随即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部分从城市疏散回乡的难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农民。土改后被疏散回乡的灾难民,部分分得了原籍地方土改中保留下来的少量公地;部分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为了安置城市疏散人口而从其他农民手中分出来的少量土地。这些人因为有了土地,自动获得了农民的身份。

然而,1955年“紧缩上海”中被疏散回乡的人口,可以分得的土地已很少了;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无地可分,也无法从其他农民手中匀出土地分给回乡人口。同样是“入城又回乡”,这些被疏散回乡者与晚清、民国时期那些到大城市读书、求职而后又回乡者不同:后者主要由于在城市中未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或成就感而回乡,他们回到家乡后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各种在大城市中无法获得的地位和荣誉感;^⑤而前者大多数本身就是因为在家乡无法生存才投奔城市,他们在原籍农村大多一无所有,重新回去后不仅不能获得各种满足感,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江苏等地政府虽然要求各

① 1955—1956年上海共有三批青年到江西垦荒,总计1700多人,只占此次移民垦荒总数的5%多一点。参见江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重返1955:上海青年志愿赴江西垦荒口述纪实》,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② 江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重返1955:上海青年志愿赴江西垦荒口述纪实》,第7页。

③ 上海市民政局党组、上海市公安局党组、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关于处理江西倒流垦民的报告》(1959年9月21日),档案号:B168—1—104,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邱国盛《略论20世纪50—60年代上海的倒流人口问题及其解决》,《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

⑤ 瞿骏《入城又回乡——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卢汉超《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及其现代意义》,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7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地干部“本着积极稳定的方针和负责到底的精神,做到回乡农民各得其所安心从事农业生产”。^①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土改后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安置上海回乡农民时大都困难重重。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主张加快农村合作化步伐;同年底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并写下许多案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很快全国各地农民绝大部分都加入了初级社和高级社。高级社的大量组建,为江苏等省最终安置回乡人员提供了条件,大部分被疏散回乡的人员被安插进合作社,即使是盲人和年纪很大的孤寡老人,都进入了社会主义,吃上了大锅饭。^②有些虽然也反复“倒流”来沪,但基本上都被再次动员回乡,最终由上海市疏散回乡的人员大多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农村人口。

1955 年外迁江西的上海垦荒群众,除了一部分返沪及外迁他省外,其他也大多借助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加入了江西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其农民的身份也得以正式成立。另外那支由团市委重点打造的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在 1955 年底由胡耀邦亲自命名为“共青社”,此后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一块金字招牌。1956 年上海团市委和江西省德安县委将共青社与当地 7 个合作社合并建立一个 400 多户的大型高级社,实际上是借助当地农民的力量来共同建设共青社。并社的同时将一些分散插社而收入过低无法维持生活的上海青年也调到共青社,并将有初中文化程度和有专门技术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提拔为干部,再从上海运送一批先进生产工具到共青社。^③1957 年江西省委再次将共青社与其他上海垦荒青年建立的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和八一社等合作社合并,全部搬迁到德安县与星子县交界的鄱阳湖畔,建立新的共青社。^④在建立新社的同时,从江苏、湖北、安徽等省招收了大批农民入社,建立新的垦荒据点,在此基础上,于 1958 年 3 月成立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上海垦荒青年成为了旱涝保收的国营农场工人。但当年即遭遇洪灾袭击,颗粒无收。为了共度灾荒,德安县委再次决定将当地 6 个农业社并入垦殖场,建立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共存的共青综合垦殖场,依靠政府投入与当地农民的支持共建垦荒农场。^⑤留在农场的上海人最终成为江西农业工人,实现了身份的转化与重建。

事实上,1949 年以后,上海减少城市人口的总目标一直没有改变。1949 年为了“反封锁”即开始动员企业、人口外迁,“一五”计划时期上海根据中央布局,提出“维持、利用、改造”和“停止发展、改造运用”的经济建设方针;1955 年更是明确提出“紧缩上海”计划,不断向外迁移各类人员。1956 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上海经济建设方针调整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紧缩”措施也一度有所放松。^⑥但上海在调整经济方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而是坚持不懈地进行人口疏散。1955 年到 1956 年上海净迁出人口 60 余万;1957 年因为放松“紧缩”而导致人口大增,当年净迁入 28 万余人;1958 年上海随即加大疏散人口力度,当年净迁出 31 万多人。^⑦此后到

① 《中共江苏省委批政法党组关于安置上海市疏散回乡的农民的报告》(1955 年 8 月 16 日)、《关于接收安置上海市回乡农民参加生产的方案(草稿)》(1955 年 8 月 12 日),档案号:苏 3085—长期—115,江苏省档案馆藏。上海为了加快动员进度,有些单位和机构对疏散人员提供了资助,上海市人力车三轮车管理所对每户回乡车工平均给予 30 元的资助,1955 年 6—12 月上海人力车三轮车管理所疏散车工 15 000 人,共计资助 375 000 元。参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交通运输办公室《上海市交通局有关人力车、三轮车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1955 年),档案号: B7—2—217,上海市档案馆藏,转引自沈斐斐《建国初期上海人力车行业研究(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2012 年,第 48 页。

② 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安置上海市疏散回乡农民的通报》(1955 年 9 月 14 日),档案号:苏 3085—长期—115,江苏省档案馆藏。

③ 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上海志愿垦荒青年在江西德安的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意见》(1956 年 5 月 30 日),档案号: B25—2—1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江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重返 1955: 上海青年志愿赴江西垦荒口述纪实》,第 8 页。

⑤ 闵小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及其活动述略》,《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⑥ 沈逸静《上海“紧缩”方针的制定、实施与调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 1949—1956》,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72—595 页。

⑦ 参见《上海公安志·户口管理·户口迁移·省际迁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4476/node58286/node58396/node58403/userobject1ai46294.html>。

1966年“文革”发生前,上海人口流动一直是迁出超过迁入,人口的外迁成为上海人口控制的基本模式。而外迁人口大多数都被疏散到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农民。

1958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上海在执行这些条例和决定的时候,一方面继续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另一方面严格户口登记与管理制度,限制城市户口的获得,并将户口与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直接挂钩,尽可能切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通道,同时也将那些从城市中疏散出去而试图返回的人口阻挡在城市之外。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一方面重提城市人口原来的农民身份,同时也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和政治运动,具体地将部分城市人口重新疏散到农村,并且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将这些城市人口固定在农村,最终得以顺利重建其农民身份,从而实现减少城市人口的目的。

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城市政府来说是相对简单、方便和经济的形式;也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重要方式。同时,通过将部分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国家也可以减少城市粮油及其他各类物资的供应,减少城市工资支出,尽可能节约和利用资金,便利国家工业化按计划展开。将大量所谓“消费性人口”、各种“落后行业从业人员”和“失业工人”疏散出大城市,也有利于大城市本身产业的升级换代和重新布局,成为新上海重新定位城市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新中国初期党的城市人口管理政策与实践研究(1949—1966)》(批准号:2016BDS001)阶段性成果,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8PJC030)资助)

(责任编辑:林超超)

(上接第222页)

- | | | | |
|-----------------------------|----------|------------------------|---------------|
| 试论近代中国外商企业债券的基本特征 | 郭岩伟(138) | “商人改革”:英国近代早期“安乐乡计划”刍议 | |
| 民国政制危机:张绍曾内阁与1923年的北京政治 | | | 柴彬(197) |
| | 严泉(150) | 读史札记 | |
| 战时统制经济与政商冲突 | | 武昌首义后章太炎在日革命活动补证 | |
| ——以20世纪30年代湖南省铤业为中心 | | ——并介绍几篇重要佚文 | 张昭军(204) |
| | 蔡群(161) | 小考敦煌文书中的“蓝” | 李艳玲(211) |
|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青年赴甘支教问题研究 | | 英语摘要 | 池楨 徐锋华 译(216) |
| | 刘彦文(172) | 2019年总目录(220) | |
| 世界史研究 | | | |
| 美国对外关系中“联盟”观念的演变(1789—1919) | | | |
| | 蔡萌(186) | | |

Abstract

Education and Cultural Power in Jiangnan: The Case of Fahua Town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U Duan**

The rel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matters to the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Jiangnan towns.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Fahua Town situated in the west of Shanghai in Qing and the Republican China , the present paper challenges the established ideas such as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by revealing the role that education played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consequent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Paradise or Dangerous Space: Public Bathroom and Social Life of Shangha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NG Hao**

Public bathroo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nghai urban lif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it's not only a body cleaning and health care place , as well as the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center. However , in the mainstream public's opinion , the public bathroom was very terrible , full of dirt , laziness and incomparable chaos. Public bath should be a simple sanitation facility in both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concession authorities' envisioning , but it faced great challenges and finally failed when the envisioning was put into practice. Looking up the root reason , we would find the contempt of state power characterized by modernity for local knowledge? was the crux that led to the "miscarriage" of reform.

Study on Urban Population Resettlement Strategy of Shanghai in the 1950s **RUAN Qing-hu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 the CPC an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divided the "non-productive" population of large cities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evacuated them by various ways. Shanghai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 and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planned to evacuate nearly 2 million people to countryside in the early 1950s. This resettlement strategy transform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to a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countryside. Finally , through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such a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 the urban evacuation population was resettled in the countryside ,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reducing urban population , cleaning up the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 and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the city into an industrial "production base".

An Early Houselease Dispute in Eastern Han **ZHANG Zhao-yang**

Having his study based on one piece of unearthed document excavated from Changsha's May First Square and dated back to 95 AD , the present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rental housing was a matter of common practice among the Linxiang resident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is practic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migration.

Reexamining Emperor Wu of South Qi's Buddhism-Inspired Abstinence from Killing **LI Meng**

Emperor Wu of South Qi (r. 479—502) was a pious Buddhist faithful and lived in seclusion in his twilight years. Convinced by the alleged auspicious signs , the Emperor took measures to the restrict the blood sacrifice.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prove that an emperor's personal religious practice could be turned into the state affair and then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eople's everyday life and the national